



第 ■ 期  

---

1983.4

# 国际关系史论丛

中山大学历史系  
国际关系史研究室编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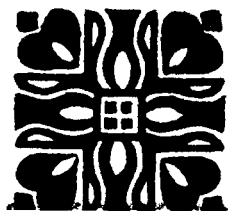
1995-2000

# 国际关系史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际关系史研究所编

# 国际关系史論丛

第 一 期



中山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研究室编

1983·4

## 编 印 说 明

为了进一步繁荣国际关系史学术研究，我室拟从今年起编印这份《国际关系史论丛》。除了本室成果之外，还将选取本校其他单位如东南亚研究所等的成果。论、译文均收。内容以国际关系史为主，尤其侧重中美关系史。

《论丛》的主编是本室主任、全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副理事长蒋相泽教授。其余编辑均由本室研究人员兼任。本期编辑是徐泽荣同志。

《论丛》的对象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教学的人员（包括业余研究者）以及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学生。内部发行。

由于是初办，经验不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 目 录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期间的中美关系  
.....蒋相泽 ( 3 )
- 试论鸦片战争前中美贸易的特点.....梁碧莹 ( 26 )
- “九·一八”事变与美国的“不承认主义”  
.....张辉强 ( 66 )
- 略论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承认.....贺跃夫 ( 80 )
- 从德兰诺瓦案到徐阿满事件看  
    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吴孟雪 ( 89 )
- 1939年苏英法莫斯科军事谈判浅析  
.....姚昆遗 ( 101 )
- 美国吞并菲律宾期间列强的角逐.....刘迪辉 ( 127 )
- 第一届勃鲁姆内阁的对外政策  
.....〔法〕皮埃尔·勒努万  
  余伟 译 ( 147 )
- 何谓国际关系学.....徐泽荣 ( 178 )
- 国际关系 ( 大英百科全书辞条释文 )  
.....〔美〕汉斯·J·摩根索  
  江炳伦 译 ( 194 )
- 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摘译.....徐泽荣 译 ( 206 )
- 再现历史：一组著名战争照片..... ( 222 )

## 编 印 说 明

为了进一步繁荣国际关系史学术研究，我室拟从今年起编印这份《国际关系史论丛》。除了本室成果之外，还将选取本校其他单位如东南亚研究所等的成果。论、译文均收。内容以国际关系史为主，尤其侧重中美关系史。

《论丛》的主编是本室主任、全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副理事长蒋相泽教授。其余编辑均由本室研究人员兼任。本期编辑是徐泽荣同志。

《论丛》的对象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教学的人员（包括业余研究者）以及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学生。内部发行。

由于是初办，经验不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 目 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期间的中美关系	
.....	蒋相泽 ( 3 )
试论鸦片战争前中美贸易的特点.....	梁碧莹 ( 26 )
“九·一八”事变与美国的“不承认主义”	
.....	张辉强 ( 66 )
略论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承认.....	贺跃夫 ( 80 )
从德兰诺瓦案到徐阿满事件看	
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	吴孟雪 ( 89 )
1939年苏英法莫斯科军事谈判浅析	
.....	姚昆遗 ( 101 )
美国吞并菲律宾期间列强的角逐.....	刘迪辉 ( 127 )
第一届勃鲁姆内阁的对外政策	
.....	[法]皮埃尔·勒努万 余伟 译 ( 147 )
何谓国际关系学.....	徐泽荣 ( 178 )
国际关系 (大英百科全书辞条释文)	
.....	[美]汉斯·J·摩根索 江炳伦 译 ( 194 )
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摘译.....	徐泽荣 译 ( 206 )
再现历史：一组著名战争照片.....	( 222 )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 期间的中美关系

蒋 相 泽

辛亥革命后，清朝的老牌官僚、北洋军阀的头子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篡夺了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

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一贯追求的政治目标，是培植和维持一个既能对他们俯首听命，又强大得足以控制全国的政权。中国人民在辛亥革命中迫使帝国主义者承认清皇朝的覆灭之后，帝国主义者又找到了袁世凯，扶植他成为中国的新统治者。在他们看来，袁世凯军权在手、精通权术，是个理想的“强有力的人物”；而他的政府，虽然和清政府一样奴颜卑膝，但却远较强大和稳定。因此，帝国主义全力支持袁世凯。一九一二年二月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国际银行团一方面马上计划给它大笔借款，一方面预付了三十一万两银子解其燃眉之急。

美国政府同样认为袁世凯是个“强有力的人物”，是“实现中国稳定的最大希望”。〔1〕一九一三年五月，

---

原文系蒋教授去年在美讲学期间的英文讲稿，现由张家展等同志协助翻成中文。——编者



美国承认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承认国书最后希望：中国将尊重和履行它的“法律义务”。〔2〕袁世凯对此当然唯命是从。他一再保证：无论是成文的条约，还是不成文的“成例”，他均将恪守。〔3〕

从外国主子方面得到种种支持之后，袁世凯便转而镇压国内的革命民主分子。一九一三年七月，他向南方的国民党发动进攻，消灭了他们在南方的一部分武力。在斗争未转化为武装冲突之前，袁世凯和国民党人均曾请求美国代办爱德华·威廉斯作调解人。威廉斯认为袁世凯能够恢复“秩序”，并以此禀告华盛顿。美国国务很快批准了他的建议，采取了不干涉政策。这就是说，让袁世凯放手镇压民主力量。

南方战败，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者对袁世凯的信心。他们相信，袁世凯确是他们一直在期待着的“强有力的人物”。这个时候，美国便抢先承认他为正式总统（一九一三年十月）。

国外的支持反过来又鼓励了袁世凯在国内谋求更大的权力。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抱怨说他的政府尚未强大到足以使“内政修明”的程度，同时宣称“内政外交之善否，又视其政府之强固与否，而国体之为君主为民主不与焉”。〔4〕他不仅要求进一步增强权力，而且业已显露了他要黄袍加身、复辟君主制度的野心。

美国人非常明白，袁世凯在骨子里是个独裁者。但对

他们来说，要紧的是袁世凯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稳定因素”。威尔逊虽然“意识到中国现行的共和制度有名无实”，但他还是“始终试图扶持那些能够维持秩序和稳定的势力。至于这些势力究竟是否民主派，甚或究竟是否共和派，他都不计较”。〔5〕一个号称自由主义者的共和国总统，在有关中国政体问题上的看法，竟和袁世凯这个独裁者的看法如出一辙，真是一种讽刺。

一九一四年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授予袁世凯独裁的权力，但他仍不满足。一年之后，他公然发动了恢复帝制的运动。

在帝制运动的策划阶段，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人弗兰克·古德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对“中华民国约法”的制订有很大的影响。一九一五年八月，他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为帝制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宣称：“今后之国家当详慎定制，维持治安，否则外人之监督恐将不免。”从这个理论出发，他得出结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6〕人们或许会说，他的文章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然而，他个人的意见与美国政府的意见并无二致。这不能仅仅视为一种巧合。美国政府同样强调维持中国国内治安，甚至准备承认袁世凯为中国的皇帝，条件是不致“招致严重的、有组织的反对”，以及袁世凯“有维持秩序的能力”。〔7〕

扶植一个既有足够的奴性以履行“条约义务”、又有

足够的权力以控制全国的人，在这点上，美国的政策与其他列强的政策没有分歧，区别仅在于美国政府企图甩开其他列强独自实行这条政策。一九一三年四月，袁世凯与国际银行团签订了一项二千五百万英镑贷款的协定。在签字前夕，美国退出了银行团。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不为袁世凯提供财政援助。它只是想推行一条独立的方针，希望开放中国的市场和资源，让各国商界和金融界自由竞争。

然而，距威尔逊电贺袁世凯“正式当选”总统不到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这使整个形势发生变化，打破了远东的势力均衡。欧洲列强都卷入了战争。美国虽然尚未参战，但也已无暇东顾。结果，日本得以成为唯一可以将其意志强加于中国而不受牵制的大国。它最不想干的就是美国政府设想的自由竞争。它的目标是独霸中国，且把欧战视作实现其梦想的天赐良机。况且，袁世凯也好，他的后继者也好，实际上都不是什么“强有力的人物”。作为军阀和卖国的专制暴君，他们决不会有民众的支持。没有帝国主义主子的帮助，他们就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当时，日本已成为在中国问题上最具决定权的大国。所以，在美国决定通过支持袁世凯和推行独立政策以扩大其在华利益后不久，就遇上了日本咄咄逼人的挑战，并且发现难以利用这些“强有力的人物”来为它效劳。在日本的进攻面前，美国节节后退。

欧战一爆发，中国便宣布中立；同时，为了阻止日本

的扩张计划，又要求美国协助防止战争蔓延到中国领土上来，建议美国设法使欧洲交战国作出承诺，不在中国领土和毗邻租借地的陆缘海域里交战。〔8〕美国政府除了答应“试探”一下对此事的意见之外，并没有什么动作。除了德国之外，没有一个与中国有关系的大国作出此项承诺。

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向德国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政府从日本和中国领海撤走它的所有军舰，并把它在胶州的租借地移交给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9〕德国政府没有答复，八月二十三日，日本遂向德国宣战。九月三日，日本从胶州半岛北岸的龙口入侵山东，该处离它的目标——胶州地区首府青岛甚远。随后，日本军队又接管了胶济铁路，深入内地二百英里，直抵济南，并占领了山东省大部。十一月六日，青岛德军投降。

在日本向德国递交最后通牒后第五天，美国国务院通知日本政府，美国“满意地注意到，日本要求胶州租借地全境内德国人投降，目的是要将这块领土交还中国，日本在中国并不谋求领土扩张”。〔10〕后来，在德军投降前，国务院复训令驻北京公使通知中国政府：“国务院认识到，若因中国的领土完整问题而使美国在国际上陷于困境，那是十足的堂吉珂德式的行为。”〔11〕这些话表明，美国是满足于日本表面的承诺，而默认它实际上对中国领土的军事占领。

在山东取得立足点之后，日本进一步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以实现其变中国为其附属国的计划。如上所述，此时袁世凯正想做皇帝，他知道，要实现这一大倒退，取得日本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日本对此亦了然。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暗示要以袁世凯接受这些要求作为日本承认他在中国称帝的条件。要求分为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问题，要求中国承认战后日德两国有关该省权益的一切协定，给予日本在该省建造铁路的权利，增加该省对外开放的商埠。第二号是要确立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优越地位。第三号要求中国同意将汉冶萍煤铁公司改作中日合办企业，该公司将垄断长江流域的矿山开采权。第四号的含义是要中国不把福建省的沿海港口和海湾让与外国。第五号要求中国聘请有影响的日本人做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中国重要地方的警政，由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的警察官署聘用多数日本人；中国必须向日本购买半数以上的军械或者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允许日本修筑南昌为起点的几条铁路；福建省如需筹借外国资本，须先向日本协商。这种亡国条件立即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激烈抗议。但袁世凯一心要日本支持他做皇帝，终于在五月九日接受了“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使美国政府深感不安，因为这些条件，特别是第五号，明显地要把中国降为日本的保护国，从而把所有其它大国的利益排挤出去。但是，美国的统治者担心反对“二十一条”会招致日本的猜忌和敌意。他们宁愿

利用这个机会与日本做交易。三月十三日，国务院向东京递交一份照会，指出日本的某些要求，特别是第五号，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和“门户开放”的原则，同时希望日本不要强迫中国接受第五号条款。不过，照会中却有两项重大让步：美国不反对有关山东、南满和东蒙的条款，并且声明：

“美国坦白承认，领土上的邻近使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发生了一种特殊关系。”〔12〕

照会表示的希望和作出的让步表明，美国愿意放弃它在这些地区的“条约权益”，以换取日本尊重它在中国其余地区的利益。

即令是关于第五号条款，美国政府在以后的照会中亦竟然建议中日双方达成某种妥协。在聘用顾问和购买武器方面应如此协议：日本将与其他大国一道分享此种权利而不受歧视。在警察问题上，“假如中国愿意让出警察管理权，则应明文规定，此条只适用于满洲和内蒙古东部，而在这些省份中，又只限于日本臣民占很大比例的地区。”〔13〕

美国作出这些让步的直接后果是，日本人立即予以公布，以示美国政府业已默许了日本的全部要求。此时“二十一条要求”已使美国舆论大哗，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对日本在远东意图表示疑虑。事态的发展使美国政府颇觉尴尬，遂从谋求妥协转为敦促日本放弃第五号要求，并扬言要发表一份公开照会以澄清美国的立场、重申它将坚持“门

户开放”政策。英国政府亦警告日本说，英国舆论认为，中日两国若因第五号要求而决裂，就会违背英日同盟的精神。五月七日，日本向中国递交了关于“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但将第五号要求略去五项留待以后讨论。我们承认，在暂时撤消第五号要求这件事情上，美国政府的压力确实有点影响，尽管这个结果应主要归功于中外人民的义愤和强烈抗议。

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美国政府不但向日本作过让步，而且还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并且是主动这样做的。也许有人会说，由于美国此时得集中注意力于欧洲，它无心亦无力东顾，所以只好默许日本的所作所为。但是，美国即使要采取这种态度，也无需主动承认日本的特殊地位。何况日本那时也并没有向美国索取这种让步。美国走这步棋的原因要到别处去寻找。在三月十三日照会发出前十二天，当时任国务卿顾问的罗伯特·兰辛曾向国务卿布赖恩提出一个建议。正是这个建议揭示了美国政策制订人的基本思想：

“我提请您考虑，政府是否可以这样声明：

美国克制自己，不强调它在南满和山东的无可怀疑的条约权利，乃是作为日本的朋友而这样做的。日本关心自己的国计民生，美国也深知日本的经济境况，知道它如有机会向南满移民从而开发这一地区，它的经济就定能得到宽舒。

“还可以进一步声明：如果美国政府出于友谊和切望日本的愿望得以实现而采取这样的政

策，它就理当可以指望日本政府方面报以相应的友好对待，作出同样亲善的表示。

“……日本政府：

“〈1〉将不再抱怨美国关于土地占有权的立法，除非此种立法是指在没收财产或实质上侵犯了既得权利。

“〈2〉将明确重申维护‘门户开放’原则，尤其要确认、在‘二十一条’涉及的地区内，此项原则也是适用的。

“〈3〉将防止日本臣民在这些地区对某些行业实行垄断，防止日营铁路和其他运输业对日本臣民其或商品实行优惠收费率或优惠待遇。”〔14〕

一言以蔽之，美国应当慷慨地把中国领土作为宣泄日本扩张潮水的安全阀，作为换取日本投桃报李的馈赠。正是这一基本思想孕育了三月十三日的照会。战时的需要只是使美国更急于达成这笔交易而已。

可是事与愿违，日本并不准备给美国以“相应的友好对待”。它自封为中国的主宰，并要袁世凯的继任者专门为它效劳。

袁世凯的卖国外交和帝制运动遭到全国范围的反对，在一片反抗声中，他于一九一六年三月取消了帝制，旋即一命呜呼。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政府的实权落在后者手里。段祺瑞是袁世凯手下的干将之一，他既继承了袁的权力，也继承了借助外国帮助来维持权力的政



策。

一九一七年二月，美国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并象对所有中立国那样，向中国递交了一份照会，建议它仿效美国的做法。三月十四日，中国亦与德、奥断交。这一步是在府（黎元洪）院（段祺瑞）之争当中进行的。美国于四月份参战后，中国便发生是否参战的争论，府院之争达到了顶点。为了争取外国的财政援助，段系军阀强烈主张中国参战。黎派害怕外国援助会增强段派的政治、军事实力，坚持继续中立，并将段祺瑞撤职。段拒绝让步。他纵容军阀张勋拥戴清朝幼帝复位，从而把黎赶下台，随后，在“拯救共和”的幌子下，他又驱张去帝，自己恢复了自己的总理职务。至此，反对他参战的阻力不大了。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国向德、奥宣战。

黎段之争反映了美日之争。当美国政府建议中国仿效美国与德断交时，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芮恩思曾立即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要它同美国一致行动。但美国政府方面却担心，一旦中国整军备战，美国若予以援助，则有招致日本反对之虞；若不予援助，日本又会趁机要求控制中国的兵工厂和军队。于是得出结论：让中国保持不动较为明智。为此，美国政府指示芮恩思通知北京：如果它采取行动，不宜超出断交范围。黎元洪正是领受了这一忠告而主张继续守中立的。

但日本却不允许中国保持不动。自一九一五年始，两年之内日本一直在提防中国加入协约国，它害怕在战后和会考虑处置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时，中国会享有独立的发言